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22·

汤用彤学术讲座之五

文化符号学导论

龚鹏程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0
47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22
(汤用彤学术讲座之五)

文化符号学导论

龚鹏程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符号学导论/龚鹏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22)
ISBN 7-301-09062-5

I. 文… II. 龚… III. 符号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565 号

书 名: 文化符号学导论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张晓蕾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62-5/C·03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7 印张 169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编者前言

“汤用彤学术讲座”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为纪念汤用彤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所作的贡献设立的。该讲座自1997年开始设立，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担任主讲。每位主讲的演讲辞和他们的其他相关论文编辑成“论文集”，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一类图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逝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由于他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又有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有能持“同情”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汤用彤学术讲座”编委会

2000年1月

序

2003年,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国林风集团和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联合举办了“第六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七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我们邀请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龚鹏程教授作为主讲教授。龚教授以《言、象、数、学:中国古代文明的符号与思维》和《由〈周易〉看象的文化符号学》为题作了两次讲演。《文化符号学导论》是他在两次讲演基础上写成的。

我和龚鹏程教授认识已多年,我不记得我们的初次会面的那一年。但1989年5月初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龚鹏程教授从台湾赶到北京参加了会议,并送给我他的《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反思》一书,也许那就是我们初次见面吧!自此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台北。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解释学和符号学都在我国有很大影响。我在考虑“中国解释学问题”时,也常常想到是否可以研究一下“中国文化中的符号问题”。恰好手头有一本龚鹏程教授送给我的《文化符号学》(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读后很有收获。于是,我就决定请龚鹏程教授来北大作有关“符号学”的讲演。

关于“中国解释学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但对“符号学问题”,我只是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它也应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对《周

易》中的“象”很感兴趣。这也是从张岱年先生的一篇文章受到启发的，他在《中国知论大要》中说：“《易传》亦认为言不能尽意，但以为可有补救之方，即可用符号表示言所不能表达之意：可以立‘象’以济言之不足。《易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全集》第一卷，第122页）“书”（字）和“言”当然都是符号，但“象”或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言不能尽意者，可“立象以尽意”。所以我总想对《周易》的“象”做些研究，但知识不够，无能为力。由此，我联想到“河图”、“洛书”等均为符号，应均有特殊之意义。后道教又有各种“图”、“符”、“箓”等等均为符号，似都可研究。但对这些“符号”似乎研究者甚少。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是否可以创建“中国符号学”呢？我想是可能的。在我看了龚鹏程教授这本《文化符号学导论》，就觉得他已经在建构着“中国符号学”，因此我认为把书名改为《中国文化符号学导论》更好。

我有一个想法，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面对西方思想文化似乎类同在我国受到印度佛教思想文化影响的隋唐之始的阶段。那时，正是中国思想文化逐渐消化印度佛教思想文化之后，而开始形成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以《法华经》为基础的天台宗，以《华严经》为基础的华严宗，先是以《楞伽经》后以《金刚经》为基础的禅宗，先后出现。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已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已是走出“中西古今”之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像在隋唐时期消化佛教思想文化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建若干中国化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等等，使中国思想文化

实现又一次新的飞跃。正如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所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学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学，那么中国也会超过他们的老师的。”（见于《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著，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近几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此我们一直做学生，在诸多方面向先进国家学习。时至21世纪的今天，也许可以说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适应当前中国和世界新形势的中国新文化。

汤一介

2004年7月7日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5年生于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兼任《国文天地》杂志主编、学生书局总编等职务。现为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等。学术研究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语言学、文献学等领域。主要著作有：《文学与美学》、《文学、文化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国小说史论》、《艺概释解》、《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道教新论》、《佛教与佛学》、《孔颖达周义研究》、《文化符号学》、《当代符号学》、《当代文化反思》、《汉代思潮》、《四十自述》等50多种。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史学中的术语出发,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的概念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符号学。全书分八讲:符号的思维:言;符号的思维:象;符号的思维:数;符号的思维:字;象的文化符号学;汉语文化学的历程;语言美学的探索;语文意义的诠释。作者努力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以期构建中国的文化符号学。

目 录

序	汤一介	(1)
符号的思维(一):言		(1)
符号的思维(二):象		(20)
符号的思维(三):数		(37)
符号的思维(四):字		(56)
象的文化符号学		(74)
汉语文化学的历程		(111)
语言美学的探索		(143)
语文意义的诠释		(177)

符号的思维(一):言

一、对语言的思维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语言,谁也不知道;如何创造出语言,更没人晓得。所以《文心雕龙·原道篇》就是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语言表达看成是人自然而然的行为。在有关语言起源的各种假想学说中,其说接近语言本能说。意谓语言能力是人的本能,其他动物再怎么学也学不来,更不能发明语言(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而正因为是本能,故只要人心中有思有感,自然便会借语言来表达

了。

相信语言是自然而有的,似乎也可以说明中国为何只有“仓颉造字”一类传说,而无发明语言的传说。盖古人认为语言乃人自然而有之能力,非神所赐、亦非某人之创造。

但语言之运用,主要是声音的传达。人在心有所思所感时,除了发声之外,原即可用手势、表情、动作等来表达,不一定非立言不可。故中国人特别指出一种语言情境,那就是在昏暗中,在手势、表情、动作均无能为役之际,语言之用独具优势。《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所指即此。《释诂》说:“暝,听也”,或《玉篇》说:“暝,注意听也”,所指亦然。昏冥之中,声音正是最主要的传

达方式。在手势、表情、动作均无能为力之际，人才非使用语言不可。

一些跟说与听有关的词，如命，《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令”；聆，“听也，从耳，令声”；令，“发号也，从人卩”；问，“讯也，从口，门声”；闻，“知声也，从耳，门声”。昏，“古文从昏”，大抵也都强调它在音声传达上的特点。隔门不见人，故以声传讯，适与昏夜不见人故扬声以示意相似。

人类学界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发出声音，最初都只是用以辅助手势的，音节语也都多少会依仿着手势语。但从中国人对语言这种声音特性的认识及强调来看，古人并不以为语言主要是继手势而用或代手势而起。因此，才会说音是“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汉语中凡从音之词，也多有昏暗之义，如暗、闇、湮都是。换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语言，其起源也可能都属于自然本能，但中国人对语言特性的掌握却颇有独到之处，与其他民族不同。

基于对声音的特殊感会，中国的语言发展当然也颇与其他民族不同。

一般都把中国地区语言划归为汉藏语系。在这个语系底下再分侗台、苗瑶、安南、藏缅诸小系。有人认为汉语、缅甸语、藏语中有非常多相似的语根，因此它们可能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古老语言：汉藏语原型(Proto Sino-Tibetan)。但邃古难征，汉语与藏语之关系，学界也仍多争论，我又不太懂藏语，故以下仅论汉语。

汉语发展的时间很长，当然颇有演变。例如中国人说养狗养猪，日本人就说是犬养猪饲，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中国人听了总要发笑，因为“狗养的”乃是骂人的话。可是古汉语

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并不罕见,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就同时用了两种语序,有宾语在前的,也有宾语在后的。

又如汉语中量词极为发达,一个人、一张床、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扇门、一根葱、一尾鱼、一叶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枪、一锭金、一泡尿、一坨屎,都有不同的量词,印欧语系语言便不如此丰富。但古汉语的量词使用原先却较简单,与印欧语系差不多。

再者,印欧语系中复声的现象甚为普遍,汉语古亦有之。依古音学家之推考,古汉语中辅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于现代的印欧语,如 dg-、tp-、dm-、ml-、nd-、mbl-、nh- 等均为现代印欧语所不常见者。但后来复声母终被淘汰了,汉语只以单音来表示。故由语序、量词、复声母等等这类事来看,汉语之演变不可谓不大。

然纵观汉语史,又可发现汉语的基本特质古今并无大异。其变化者,一是古有而渐丰,如量词在先秦,虽已有之但尚不发达,魏晋才大量出现。这种变,其实只是发展,只是踵事增华。在古人说:“孚马四匹,孚车卅两”(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墟文字乙编,7645)“其示登新鬯二升,一亩”(殷契粹编,525)“予光赏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时,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后才会广泛地以不同计量词去指称每一不同的物事。

另一种变化,则是选择的结果,例如上文所谈到的词序和复声母。词序渐渐稳定,以宾语放在动词后面为主,复声母则遭放弃,都是有意识的作为,故是变本而加厉。

这也就是说:语言虽然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中国人也认为

用语出于自然,但对语言的意识,各民族并不一样。各民族语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于此。本于这种“对语言的思维”,各民族分别创造了他们的语言。汉语相较于其他语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显示古人在造语时特具的思维状态或倾向。顺着这些状态或倾向发展,后来汉语遂越来越与其他语系不同了。某些与其他语系类似的语言现象,则也已逐渐淡化或改变。

语言,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于此。故对语言的思维,也是思想史的起点。中国思想史,即应由中国人如何看待语言、如何创造语言、如何发展语言特色讲起。

二、词的特点

从语音形式看,汉语的词,有单音节的,如天、地、山、水;也有多音节的,如观世音、王八蛋、社稷、君子。但多音节的词,其实仍是单音节词的缀组,其词单独仍可成立,故多音节的复合词,仅是单词在使用上的辅助或变化。正因为如此,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整个汉语,乃是一个与其他语系极为不同的单音节语言体系。

单音词的特点,是简无可简,结构上已不可再分。一个词指一件事、一个概念、一个动作、一种基本性状。而词音与其所指之间,则亦非毫无关联的任意编派。

古代的语音现象,如今当然已无法复原了,但部分语音现象仍可于文字中寻其遗迹,因为文字本来就有部分记录语音的功能。历来均说中国文字为象形,殊不知汉字十之七八是形声,形声的音符部分就是表音的。转注、假借,在汉语及汉字中亦屡见不鲜。而两者也都与音有关。假借是同音字相替

代,转注是有声音关系的同义字。同音字可以替代、有声音关系的字可以同义互训,正表示古人认为声音与意义是有关联的。某事某物之所以唤为某某,非任意为之,声与义相关,故同音者义近,可以替代或互相解释。

同理,形声字的声符除了表音之外,亦有表义的功能。这个道理,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均曾予以阐发,认为形声必兼或多兼会意,如支声词有分支义,肢、枝、歧都是;少声词有微小义,杪、秒、眇、妙都是;囟声词有中空义,窗、葱、聪都是;仑声词有条理义,纶、论、伦、轮都是;交声词有纠缠义,绞、狡、饺、校、跤、咬都是;奇声词有偏斜义,倚、寄、畸、骑都是;皮声词有分析或偏颇义,披、破、簸、颇、跛、坡都是。古代词书,如刘熙《释名》;或近人著作,如章太炎《文始》、高本汉《汉语词族》,也都循此原则去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之方法也可以找出汉语的同源词。例如枯、涸、竭、渴、槁,声音和意义都相近,即是同源词。此类词不见得字形相近,而纯是声音的关系。如背、北、负、倍,均有相反义;逼、迫、薄,均有靠近义;冒、蒙、冥、盲、雾、瞽、梦、眠,均有迷蒙不清义;陟、登、腾、乘、升、蹬,均有升高义;无、莫、靡、亡、昧、罔、蔑、勿、毋、不、否、弗,均有否定义等等。这些词,更明确体现了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单音词,一词一义,且词之音义如此密切相关,这些都是汉语的特点。然而,汉语另一些特点,恰好是与它们相反的。比如,一词多义。

单音词是最简化的词形,一词一义。但词义因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繁、指涉越来越多,势必越来越扩大,这时单词便不敷使用了。除非不断增造新词,像印欧语系那样,词典越编

越厚、收词越来越多。可是，汉语语音的音节单位是有限的，单词并不能像英语那样增造新词。此时就会出现派生词（如有虞、有夏、勃然、莞尔）、复合词（如壁虎、土虱），不再只用单词。甲骨文的复词已有 35 个，金文便达 237 个，后来越来越多。因一词一义的单词，会随机与另一个单词组合而再变出另一个词及另一个意思来。所以也不需另造新的单词。

另一个让单词不增加而又能适应指义需要的办法，就是让单词可以指不同的义，一词多义。这看起来与单词原来确指一事一义相反，但词义的来源若在音声，则声变有限，义指无方，一声之中本来也就蕴涵多种意谓。如后来常见的释义法：“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纬·千凿度》）“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毛诗正义·诗谱序》），“深察王号之大义，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都是以一音之周流说义蕴之多方。可见单词多义，有其必然性在。中国人也善于掌握这个原理，好好地发挥了一番。

如何发挥呢？一词多义虽然是各民族语言的普遍现象，可是汉语单音词的多义状况最特别。本义、引申、假借，可以多义流转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如绳，是绳索，是绳墨、纠弹、正直，也是惩办（绳之以法）。引，是开弓、拉长、引导，也是拿取。首是人头、首领、发端、首要、朝向，也是自首。归是回家、出嫁、汇聚、归属、依附、自首、称许、趋向、委任、归还、终于，也是死亡。凡此等等。词义非常广延灵活。

其中更为特别的是“正反合义”和“词性不定”。

一词多义中，往往包括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谓之正反合意。如花落，是指花的生命结束了；大楼落成，却是说楼刚

刚建好。故《楚辞》所谓:“餐秋菊之落英”,可能指的就是始英而非残卉。落,兼开始与结束两义,相反相成。

同类者,如乱,治也。乱与治恰好含意相反。一个乱字即兼治乱两义。面,既是面对面又是相背,如面缚就是指反背而缚。薄,既是少,又是多,如薄海腾欢之薄。逆,既是违背又是迎接。息,既是气息又是停止休息,既是增长(如利息)又是减少。隐,大也。废,大也。归,往也。戾,善也。危,正也。诞,信也。虔,杀也。嗇,贪也。让,诘也。寥,深也。困,逃也。亢,遮也。眇,远也。……这些都是正反合义。乖,既是乖张也是乖巧。易,既是变易又是不易。其他语文中非无此类语例,然远远不如汉语普遍。传统训诂学上所谓“反训”,所指即为此一现象。盖为常态,并非特例。

词性不定,则是因一词多义,绳指绳索时是名词,指绳人以法时就成了动词,很难定称某词的词性如何。本来,跨词性的词,各种语言中也都有,如英语的 fire 是名词火,也可以是动词点火。Home 是名词家、动词回家、形容词家乡的,也可以是副词在家。但汉语情况特殊。印欧语言,可以依词性不同分为八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接词、叹词、冠词。汉语则自《马氏文通》模仿印欧语也分词为九类(加了一类印欧语所无的“助词”)以来,争议不断,大部分语言学家都主张汉语之词性难定或可以活用。“春风风人”,上“风”为名词,下“风”为动词,风又为风化之风、风教之风、风诗之风、风动之风、风土之风、风谏之风,义不定,词性也就不定,很难把词分类。

一词多义、正反合义、词性不定,都是其他语言也有,但汉语特别普遍的现象,可称为汉语之特色。助词则更是特色了,因为印欧语就没有助词。